

日本台灣史研究與教育概況

——以社會經濟史為例——

金丸裕一

一、前言

長期以來，本人一直將日本與台灣視為研究的主要活動區域，並從事有關研究、教授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經濟史，以及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為止的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工作。因此，對於台灣史研究這個新興領域，毫無疑問地我可以說是一位「門外漢」，也因此當初在允諾此次會議報告時，個人有諸多的猶豫。而且，台灣近現代史的結構是相當複雜的。這是因為：多數的研究是以到滿清末年的階段為止，以「中國史」為構架來進行分析，而日本殖民地時期是編入「日本史」的領域，至於 1945 年到 1949 年的這段時期，也只能針對「中華民國史」進行考察，但對於之後變動起伏的歷史，則必須借重不同於以往的分析裝置來進行研究。再者，現存的多數史料中依據「統治者」的語言與觀點所記錄下來的事實，使我們的思考變得更為複雜。

眾所周知，日本的台灣史研究在邁向 21 世紀的今天，有了飛躍性的發展。這個現象的產生與曾為禁區之台灣史研究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忽然興起的現象相互呼應。除此之外，1980 年代開始正式運作的「台灣史研究會」，以及 1998 年集結了日本的台灣研究者共同成立的「日本台灣學會」等等的事實，均顯示了研究的發展。

歷史學界方面，在根據不同的區域、主題對年度學界動向進行匯整的『史學雜誌』中(東京大學文學部、史學會發行)每年 5 月份的專刊「回顧與展望」，首次將長久以來的台灣近現代史的成果，納入中國近代史或現代史的一部份。在 2001 年 5 月發行的雜誌中，於「中國近代」的結尾處增設了「台灣」的項目，開始刊

登了台灣史研究學專家的總覽。之後更於 2003 年 5 月後，以與「中國近代」或「中國現代」的同等資格，將「台灣」完全由中國史裡「獨立」出來。

本文由於篇幅的關係，更由於筆者本身的力量有限，因此不再對個別研究的成果作詳細的評論。有關近年來日本的台灣史研究動向，已有許多卓越的導引¹⁾。再者，由日本台灣學會所製作的「戰後日本的台灣關係文獻目錄」²⁾也透過網路向大眾公開，因此留給我這個「門外漢」的研究課題也就十分有限了。加上近年來吳文星、吳密察、陳慈玉、林滿紅、劉翠溶、謝國興、薛化元、許雪姬、游鑑明、陳其南、朱德蘭、林玉茹、李毓中等多位，居住於台灣的研究者在日本國內發表論文的次數也大大地增加。以上種種均可以說是日台學術交流下的寶物，但在此還是予以割愛不逐一介紹。

如同前文所述，在短短的 100 多年，各個領域交錯相關的歷史便是「台灣史」。筆者以「中國史」和「日本史」的研究基礎為出發點，由外側來觀察「台灣史」，同時就未來研究及教育的理想狀態，提出若干的建議，這就是本文的中心課題。由於我本身的專業領域的關係，本論文所介紹的研究會偏向社會經濟史的領域，關於政治、外交、文化、文學、民俗，甚者中華民國台灣時期(1949 年～)的大部份研究，即使是深具研究旨趣味的研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亦割捨該部分的論述。

二、台灣史研究的幾個系統

筆者在文學院研究亞洲史的 1980 年代前半，有關台灣史的著作，記憶中大多是由當時在日本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例如：王育德、許世楷、黃昭堂、彭明敏、戴天昭、戴國輝、劉明修(伊藤潔)等人所撰寫的。這幾位學者不得不選擇在日本學界發表言論的理由我想我不需要再加以說明。即使到了台灣民主化有充分進展的 1990 年代，這項傳統還是被傳承下來。許多研究人員在日本不斷地鑽研，並提出傲人的學術成果。當然目前，日台兩國可以自由往來並不斷地進行交流研究，對於過去台灣人研究員的「特殊」印象完全被抹去。如果以此為前提，本文或許應該詳細論述台灣留學生的研究成果，但在此，本文之內容僅侷限於視台灣史研究為「外國研究」的研究者之介紹。

第一類型為，日本史研究者或日本殖民地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以滿州國經濟史為主，進行實證研究而聲名大噪的山本有造，對構成「帝國日本」的台灣具有高度關心，其在『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社，1992年）中，清楚地分析了台灣的經濟構造。對於海外領地的金融問題研究具有彪炳業績的波形昭一，除了在『民間總督三好德三郎と辻利茶舗』（日本圖書中心，2002年）這本書中，仔細地校正、解說分析未以日本語公開出版的史料之外，還主導了亞洲的日本人經濟團體的研究³⁾。近藤正己的『總力戰と台灣』（刀水書房，1996年）則是分析關於台灣戰爭與殖民地體制崩壞的大作。朝鮮經濟史研究權威的堀和生對於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也可提供了可以啟發我們的素材。也就是說，從東亞近代經濟史的台灣，或與殖民地朝鮮的比較等觀點，可以顯現出台灣經濟史的展望⁴⁾。

第二類型為，東洋史研究者以及亞洲研究者的研究系統。被評價為日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宗師－若林正丈的研究，其研究貢獻不僅是在歷史領域，對日本整體的「台灣印象的形成」亦貢獻良多，因此對於若林正丈的研究本文不需要特別加以介紹。此外，在明清史研究上表現優異成就的松田吉郎，在探究少數民族「內地化」的現況與侷限，以及關於土地問題的實證分析上亦獲得卓越的成果⁵⁾。上述類型的研究者，因具有良好的漢文以及中國語的基礎，因此在後述的少壯派研究者中其佔有宗師的地位。

除此之外，第三類型是，民俗學或文化人類學、教育學等的人文科學研究者，特別是在其中有選擇台灣做為其田野調查工作的對象，對此進行研究鑽研的研究者。尤其，多年來由於相同的調查活動在中國大陸受到牽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這樣的傳統更是根深蒂固。山路勝彥的「高砂族」的調查、探討日本帝國圈之人類學以及民俗學研究的應有研究態度的中生勝美與坂野徹等人的著作，可說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⁶⁾。特別是，所澤潤耗費心力完成的口述歷史，對於傾向於「支配者的史料」的台灣史而言，可說是日本研究者默默的一種積極嘗試⁷⁾。

再者，第四種類型是對台灣激烈的變動抱持著關心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由於他們對於歷史背景的了解，因而不能忘記歷史領域上所分析過的實例。若林正丈之後，就任第二任日本台灣學會理事長石田浩的一連串成就，因極負盛名故不需要

在本文中加以介紹。此外，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團隊的溝口敏行、梅村又次的『舊日本植民地經濟統計—推計と分析』（東洋經濟新報社，1988年），補充了類似統計的不足之處，亦可謂具有相當的成就。再者，爲了鞏固對殖民地的支配而整治的交通基礎設施，不僅僅引發了日本人同樣地也引發了台灣人的觀光熱潮，在曾山毅的『植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青弓社，2003年）中，可以明確地體現觀光學者新穎的問題意識。

三、促進飛躍發展的研究者

目前可以閱讀到包含「台灣」這個固有名詞的日文雜誌中，經常刊載歷史學相關論文的雜誌，只侷限以下在極小範圍。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1～6（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8年～1988年。

『台灣史研究會會報』1～4→『台灣史研究』5～16→『現代台灣研究』17～（台灣史研究會），1983年～。

『天理台灣學會年報』1～14→『天理台灣學報』15～（天理台灣學會），1992年～

『台灣原住民研究』1～（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1996年～。

『日本台灣學會報』1～（日本台灣學會）1999年～。

當然，由於許多的學術論文係刊載在其他的亞洲關係、中國關係、歷史學關係等雜誌中，或在各大學與學部發行的紀要中發表，因此上述的一覽未必是明確的資料，不過，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窺看出台灣史研究的真正的蓬勃發展，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現象。

此外我們必須指出，近年來的特徵是，從研究所時期乃至於大學時期開始，即以台灣史研究爲主軸展開研究活動的日本學者的出現。亦即以先前，因局限的研究區域，在就職上極爲不利的領域爲研究志願的少壯派的掘起。

特徵的現象包含了：少壯派的研究者選擇極微小的主題，積極持續實證研

究。該現象，與 1990 年代中期起，完成研究所畢業後即取得博士學位的新習慣現象有密切的關聯。

山田敦之極為詳細且實證的台灣產業化過程研究，除了將工業化之土著資本的運動納入其研究領域的考察之外，亦考察了穀物、茶業等農業領域，正式地開拓了相關的研究領域⁸⁾。三澤真美惠所研究之殖民地時期台灣的電影與社會的深具旨趣的構造分析；李承機的新聞媒體史研究；川島真、貴志俊彥、孫安石等人的東亞廣播史研究，上述等等研究都是先前未曾有過的新鮮主題⁹⁾。松金公正之透過佛教而產生之日台兩國的交流的研究，橫井香織之以台灣為據點的日本對外調查史的分析，透過讀解英國外交文書，闡述台灣殖民地時期的「由外的認識」之梶居佳廣的研究等等，均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題¹⁰⁾。總之，本人對於少壯派研究者抱持著很大的期望。

經濟史方面也有豐富的成果。河原林直人所研究之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在世界經濟中台灣茶葉成長史的研究，北波道子之透過能源消耗的擴大來解讀電力產業史的研究，湊照彥之對戰後史的展望之金融史及重化學工業部門的研究，以及堀內義隆對於殖民地時期小規模資本的分析，每一份研究都是從批判的角度地讀解日本與中國兩國所保存的史料，並顯示出相當高的研究水準¹¹⁾。

或許是刻苦勤勉所獲得的成果，數年前起，以台灣史為專門研究的少壯派研究者，開始以專任教師的身分任職高等教育機關。包含了山田敦(名古屋市立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三澤真美惠(日本大學文理學院)、松金公正(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院)、河原林直人(名古屋學院大學經濟學院)、北波道子(關西大學經濟學院)等精英。這個變化對於培育日本後世代而言，是一個充滿喜悅及希望的現象。但反過來思考的話，要如何使「個別事例」提昇為「整體象」構築一事，將是學界未來的課題。

到了 2006 年，運用國家預算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雖然開始了「日本對朝鮮、台灣的統治及殖民地官僚」的共同研究，但這也可能只是單純停留在集結日本研究者之共同研究的範圍。另一方面，私立大學中的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

所，長久以來致力的台灣史研究成果，也是非常珍貴的。這裡所積累的經驗，不僅超越大學的框架限制，對於以下所論述之「教育」問題方面，也被認為帶來了優良啓發，而對於將學校法人利益置之度外之長期性觀察與研究實施者的長年努力，同樣感銘在心¹²⁾。同樣的，日本財團所贊助之 2000 年度開始的「台灣歷史資料研究會」的先驅實踐，做為今後發展的試金石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雖然是題外話，由於本文介紹的論文係刊登於各式雜誌中，即使是日本國內的蒐集作業也需耗費相當的時間。而在台灣的作業更是麻煩。例如，台北交流協會等處集結上述各篇論文的本正以及電腦系統的結構，就應該緊急檢討改善。

四、對於台灣史教育的個人意見

到目前為止所介紹的研究者們，幾乎全部都任職於不同的大學，且所屬的領域非常多樣化。根據本人立於教壇 15 餘年的真實感想是，在考慮日本大學教育的課程問題時，有一種狀況是，要在一個研究機關培育養成「台灣史」研究之後進是一件困難的事。換句話說，即使是在著名台灣史研究者所屬的大學內，依然處於一種未曾開設有專門訓練用以學習「台灣史」之基礎力量的科目的嚴苛現狀。

尤其是研究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的部分，日語的第一手史料與第二手史料的讀解作業是不可欠缺的¹³⁾。並且，如果不是現代使用的日語，而是 60 年到 110 年以前的「近代日語」的話，在公文的部分，有許多是手寫的文件，對於著手於草體字之解讀之未經專門訓練的人而言，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於，還必以了解殖民地台灣之各種事件為前題，預先整理宗主國日本的法律、制度、官制、人事、經濟、教育、文化等等的各問題。目前在日本，設有多少能夠符合上述條件的課程的學科，大概只限於文學院史學系的「日本史學專科」。因此，特別是以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史為志願的學生，本來應先徹底進行日本史學的基礎與應用的訓練，之後才開始進展到台灣史的研究，雖然是繞道而行，但實際上這才是最為踏實的學習路徑¹⁴⁾。

反觀台灣最近的台灣史熱潮，如果能夠針對這方面的訓練進行更組織性與計

劃性的規劃，不難想見整體的研究水準將呈現飛躍性的提昇。本人熱切期望今後在台灣的研與教育的計劃中，都能夠以更專門的方式訓練日本近代史、日本現代史，並研討具體方法來招聘能夠指導解讀以日語書寫之各式公文或私人文件的研究者。一般而言，專攻日本史並精通中文的研究者少之又少，因此從事教育時，語言的問題是絕對無可避免的。

再者，即使是從台灣到日本留學的案例，上述各點同樣重要。筆者在此想要一提的是本人在專業領域上再三日擊到的惡例。在日本學習中國經濟史或中國經濟論的部分中國留學生，會故意選擇未受過研究中國所需要之訓練的指導教授(例如：研究金融論或是國際經濟論或企業論等的學者)，再利用教師專業知識的不足，使用舊有資料，最嚴重的例子是將中文寫成的論文翻譯成日語(實際上是抄襲)，集結匯整成「學位論文」。未具備基本體力的運動選手，其運動壽命必然不長，但是想像這些選手將成為指導者時，不禁叫人背脊發涼。

五、結語

鑑於本文中簡介之近年來日本國內的台灣史研究，可指出下述幾點。

日本國內的獨立研究、教育機關，在學科構成或人員配置，甚至於教育課程上均有所限制。殖民地時期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日本史基礎力量的養成，對於清末與戰後台灣到中華民國台灣時期(1945年～)為止的研究而言應做為前題的中文能力(當然也包含史料的解讀)，可說是無法完全傳授。

同樣的，就台灣的台灣史研究而言，亦可視為是共同的弱點。將來為了克服這些課題，除了研究者個人或團體研究必須繼續努力外，還必須探討如何大規模地配合培育後進。期待超越相互舉辦研討會、共同執筆著書、交換留學生、網路公開史料等次元之更具體的作業的展開時期及早到來。

為了培育後進世代，特別是為了培育即將成為研究之執行者之正在進行研究所博士課程的年輕後代，誠摯希望可更進一步實踐本文所介紹之幾項配合方法，

並普設由日本與台灣官方、民間教育部門協力合作的「台灣史教育訓練中心」機構¹⁵⁾，並以此做為拙文之總結。(2006年11月28日)

註釋

- 1) 栗原純「矢内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と戦後台灣殖民地研究」(『20世紀の中國研究』研文出版, 2001年), 檜山幸夫「日本における台灣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台灣史研究會編『台灣の近代と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2003年), 以及岡本真希子「殖民地期台灣に關する近年の研究動向」(『日本殖民地研究』16, 2004年)。
- 2)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灣關係文獻目錄」<http://web2.koryu.or.jp/taiwanstudies.nsf>
- 3) 波形昭一編『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經濟團體』(同文館出版, 1997年), 波形昭一他編『近代日本の經濟官僚』(日本經濟評論社, 2000年), 柳澤遊, 木村健二編『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經濟團體』(日本經濟評論社, 2005年)。
- 4) 堀和生等編『東アジア經濟の軌蹟』(青木書店, 2001年), 同『日本資本主義と朝鮮・台灣』(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2004年)等。
- 5) 松田吉郎『台灣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晃洋書房, 2004年)。其他請參照『兵庫教育大學研究紀要』等的刊登論文。
- 6) 山路勝彦『台灣の植民地統治』(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2004年), 同『近代日本の海外學術調査』(山川出版社, 2006年); 中生勝美編『植民地人類學の展望』(風響社, 2000年); 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勁草書房, 2005年)。
- 7) 所澤潤的口述歷史屢次在『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會科學編』中刊登之外, 「專門學校畢業者と台北帝國大學」(『地域史の可能性』年報, 近代日本研究19, 1997年),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の成立と組織の繼承」(『東洋文化研究』2, 學習院大學, 2000年)等等的實證研究中也有引用。
- 8) 山田敦的論文數量很多, 這裡列舉幾篇「台灣茶業における台灣人資本の發展」(『社會經濟史學』61—6, 1996年), 「殖民地時代末期台灣工業の構造」(『人文學報』79, 1997年), 「台灣總督府土木局の技師について」(『名古屋市立大學人文社會學部研究紀要』10, 2001年)。
- 9) 三澤真美恵「殖民地時期台灣の映画普及における『分節的經路』と『混成的土着化』」(『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15-3, 2004年), 同「日本殖民地統治下の台灣人による非營利の映畫上映活動」(『歷史學研究』802, 2005年); 李承機「殖民地新聞としての『台灣日日新報』」(『植民地文化研究』2, 2003年); 貴志俊彦, 川島真, 孫安石『戦争 ラジオ 記憶』(勉誠出版, 2006年)等。
- 10) 松金公正「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臨濟宗妙心寺派台灣布教の變遷」(『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12, 2001年); 横井香織「日本殖民地時期台灣における「南洋」調査活動の展開」(『現代台灣研究』17, 1999年); 梶居佳廣『「殖民地」支配の史的研究』(法律文化社, 2006年)。
- 11)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灣』(世界思想社, 2003年); 北波道子『後發工業國の經濟發展と電力事業』(晃洋書房, 2003年); 湊照彦「殖民地時期及び戦後復興時期台灣における化學肥料需給の構造と展開」(『20世紀の中國化學工業』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2005

- 年)；堀内義隆「殖民地時期台灣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發展」(『調査と研究』30, 2005年)。
- 12)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成果根據淺見如下。『台灣史料網文』上・中・下(成文堂, 1986年~1989年)；『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1~20+(ゆまに書房, 1993年~)；『台灣的近代と日本』(中京大社研, 2003年)；『日本統治下台灣の支配と展開』(同上, 2004年)；『日本領有初期の台灣』(創泉堂出版, 2005年)；『現代の公文書史料學への視座』(中京大社研, 2006年)。
- 13) 例如, 川島真對於許雪姬監修『許丙・許伯土延回想錄』(中研院近史所, 1996年)之積極參與, 可視為一模範事例。
- 14) 由此一側面來思考的話, 加藤聖文等撰『台灣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2002年)一書, 有利於做為中長期使用的工具書。
- 15) 日本近年來因「研究所重點化」政策的推廣, 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急速增加, 但因大學教師名額未增加之故而無法就職的「浪人」有持續增加的趨勢。兼任講師即使一週教授5堂課(1堂課90分), 月收入也在15萬日圓以下。因此例如精通日本近代史之史料解讀的優秀人才, 長年為「浪人」的例子亦多, 當然選擇任教於台灣的大學, 也是一種實際的選擇。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Japanes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Taiwa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Yuichi Isaac KANEMAR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critic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historical studies of Taiwan, with a focus on the research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1990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searchers began to work on Taiwanese history. This was an area that had, in the past, been researched by a small number of Japanese researchers and by researchers from Taiwan (and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Taiwanese researchers, by individuals who could not return to Taiwan because of anti-Chiang Kai-shek speech and / or conduct, or because of their involvement with th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is increase can be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 explosion of interest in Taiwanese history in Taiwan, and by the rapid opening to the publ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owever, given the condition of the materials that still exist, research of Taiwanese history is a very difficult field. This is because researchers must have an abilit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documents that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ose researching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Moreover, since much of the material documentation that is left was written in Japanese by the ruling Japanese, the researcher faces a problem that is seen with much colonial history, in that the thoughts and action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colonized, must be read through the filter of the words of the colonizers.

In this paper, work was conducted with these issues in mind, an attempt was made to identify those areas in which Japanese researchers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historical studies, and a number of concrete opinions have been outlined.